



印度农民的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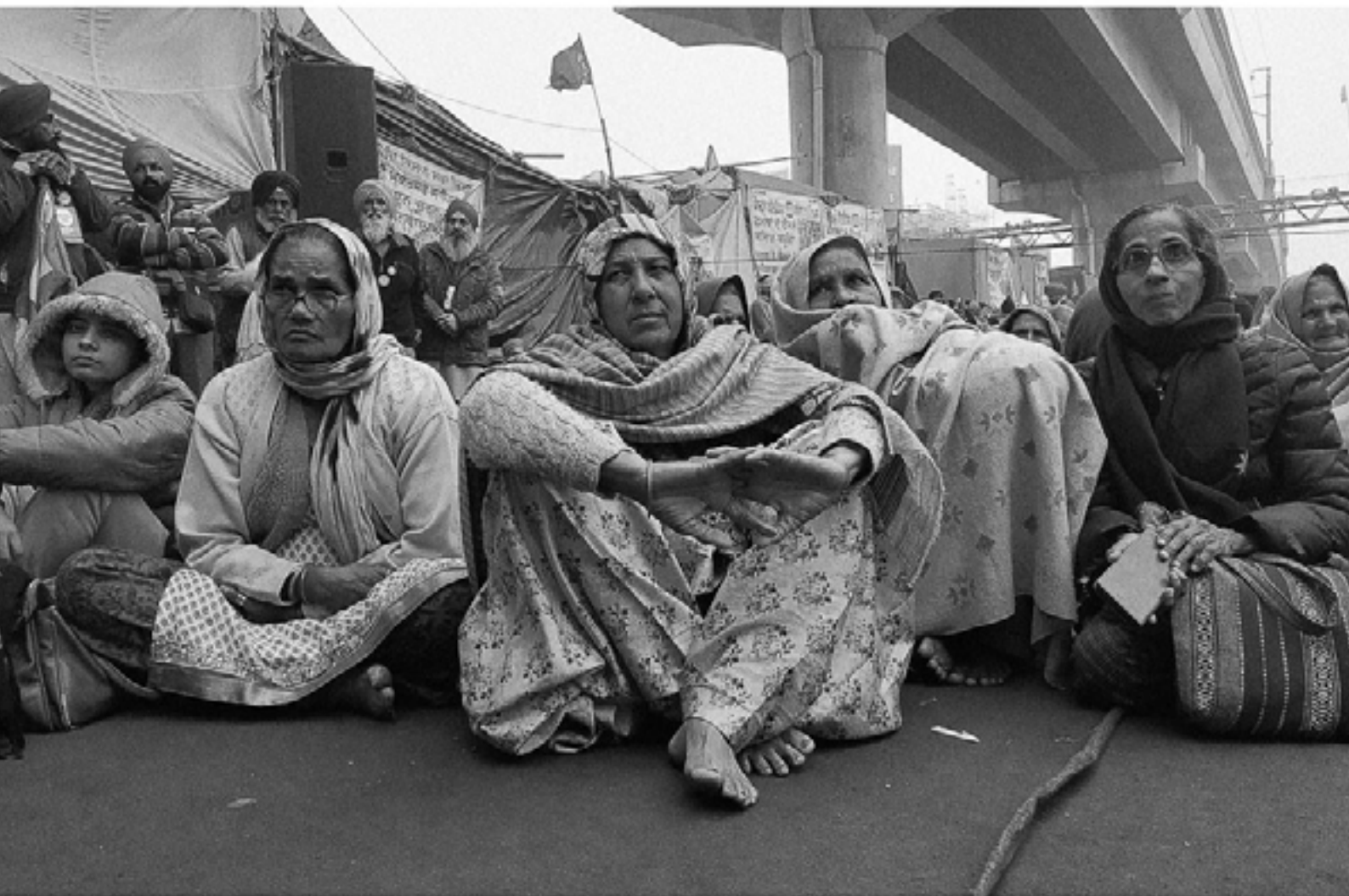
汇编41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2021年6月

印度农民的抗争





2021年1月24日，来自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农妇在德里与提克里交界处进行抗议。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这些图像的主角是农民，不是主流媒体所污蔑的“暴徒、寄生虫、恐怖分子、分裂分子”，也并非身份不明的乌合之众。

他们有名有姓，坚持抗争，意志坚定，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阶级的具体图景。

这是一场历史性抗议活动的壮观景象。

本文中的照片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艺术部成员维卡斯·塔库尔拍摄。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月，维卡斯以德里为基地，每周都会前往辛古和提克里交界处的两个关键抗议点。他用一部小米 Note 6 手机记录了农民的反抗。维卡斯说，“一开始，我只是想拍些照片，以便存档。”这些真实图像的主角大多是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的农民，他们有怒有喜，冒着严寒驾驶拖拉机，在货车上读诗，庆祝宗教节日。这是一个阶级的具体图景，是一场历史性抗议活动的壮观景象。

印度正被第二波新冠疫情所笼罩。5月份日增确诊人数超40万，卫生系统瘫痪，医院床位饱和，医疗氧气罐耗尽。死亡率飙升，火葬场上排起长队。当公众都在关注德里和其他城市中心时，不为人知的死亡病例正在印度北部农村蔓延。患者死于“发烧”和“呼吸困难”，这些都是新冠疫情的常见症状。由于许多人没有接受新冠检测，因此并未纳入官方死亡数字。

2020年9月，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及其极右翼人民党领导的印度政府在既没有事先与农民组织协商、也未在议会进行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三项直接影响农业的法案。农民马上就意识到这三项法案将使他们沦为印度大企业的准农奴。他们发起抗议，尽管受疫情影响，抗议活动仍持续了数月。

2020年11月，参与抗议的农民和农业工人首先向德里进军。在被阻拦在德里郊外后，抗议者在国道沿线搭建了抗议营地。大规模行动开始于旁遮普邦，很快发展到哈里亚纳邦、北方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在第一波游行后的几周内，抗议浪潮席卷了整个印度，从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到东部的比哈尔邦，再

到南部。在 2021 年 1 月 26 日共和国日这天,农民和农业工人冲进了首都新德里。他们用行动表明,纪念 1950 年印度立宪的这个日子也是属于他们的纪念日。

被企业控制的媒体诋毁农民,污蔑他们是暴徒、寄生虫、恐怖分子、阻碍印度发展的分裂分子。农民没有畏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代表着整个阶级,这场斗争事关生存:接受政府的新政策就等于扼杀和摧毁自己的生计和生活方式。他们明白,这三项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农业更多的控制权将落入大资本家手中,如安巴尼家族和阿达尼家族。从全印农民协会 (All India Kisan Sabha) 到印度农民联盟 (Bharatiya Kisan Union) 的一系列农民组织,向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伸出了援手,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来保护农民的权益,要求撤销这三项法案。

抗议活动并未因为农民谨慎应对疫情而减弱。人民党政府拒绝让步,农民决定坚持到底。无论结果如何,印度农业无疑正处于摇摇欲坠的边缘,而莫迪政府却一心想要把它推下悬崖。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长期的农业危机,危机中的印度农民仍在为生存而斗争。莫迪的三项农业法案将摧毁农民仅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农业部门拱手让给由企业控制的生产以及全球供应链。

什么是农业危机?它是一种慢性病,其症状多种多样:农业生产不稳定,比如由作物歉收而导致的薄利乃至亏本、生产高负债率、失业、失地、自杀等。本文将对这场危机追根溯源,这并非一件难事,但需要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以及 1947 年独立后新印度所遭遇的一系列失败讲起。印度农业的发展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行动缓慢却又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它在过去的 75 年里变化甚微,新事物的出现并不能扫除旧势力。想要理解这只乌龟为何现在身处险境,我们必须追溯它的整个旅程。



2020年12月5日，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卡车中的抗议农民。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往昔岁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757 年刚控制印度时便着手拆解和重组其旧有经济关系，以便榨取贡赋。虽然不同地区所受对待不同，但主要掠夺方式是相同的。土地从农民手中剥离，转变成可以买卖的地产，柴明达尔这样的新兴中间人则向农民收取高昂的租金。1770 年，东印度公司统治的第一个印度地区孟加拉遭遇饥荒，三分之一人口丧生，英国人却袖手旁观。东印度公司统治之前的农村社会称不上是天堂，但在东印度公司和 1858 年后的英国王室统治期间，农村成了农民的人间地狱。

据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内克统计，从 1765 年到 1938 年，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里，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榨取了约合如今 45 万亿美元财富。换句话说，这些掠夺的财富相当于印度目前 2.5 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20 倍。

这种严重的资源流失，使得印度农民即使在丰年也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生存。而在雨季不力的歉年，农民只能勉强凑出交税的钱，然后忍受数月的饥荒。苛捐杂税使得农民在丰年无法存钱存粮，在歉年时便朝不保夕。当干旱或作物歉收时，农民没有缓冲的余地，饥荒肆虐无法避免。

1850 年至 1899 年间，印度农民遭受了 24 次饥荒，每两年一次。这些饥荒导致数百万计人死亡：在 1876-1879 年的饥荒中，有 1030 万人死去；在 1896-1902 年的饥荒中，有 1900 万人死亡。曾报道 1876 年金奈饥荒的记者威廉·迪比在 1901 年写道：“当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评价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的功绩时，数百万无辜死亡的印度人将是其最臭名昭著的‘丰碑’。”

对这些饥荒的记忆，特别是 194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使得新印度政府废除了对农民的税收，防止饥荒再次发生，使农民能够将收入投资于土地来提高粮食产量。在干旱时期，政府确保农民能获得粮食，以防饥荒。虽然饥饿现象仍然存在，但是饥荒已被消灭。

然而，由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把控的印度政府，保留了英国人的农业经济等级体系。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独立后的印度并没有破除农村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在某些地区强大的左翼运动的压力下，印度政府不情愿地实施了土地改革。由于地主控制了地区政治，土地的重新分配微不足道，对土地持有量的限制也并未实施。土地租期法规在不同邦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些邦的农民获得了他们所耕土地的所有权。但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对小农和无地农业工人的新型封建剥削仍在继续，他们大多来自受压迫的种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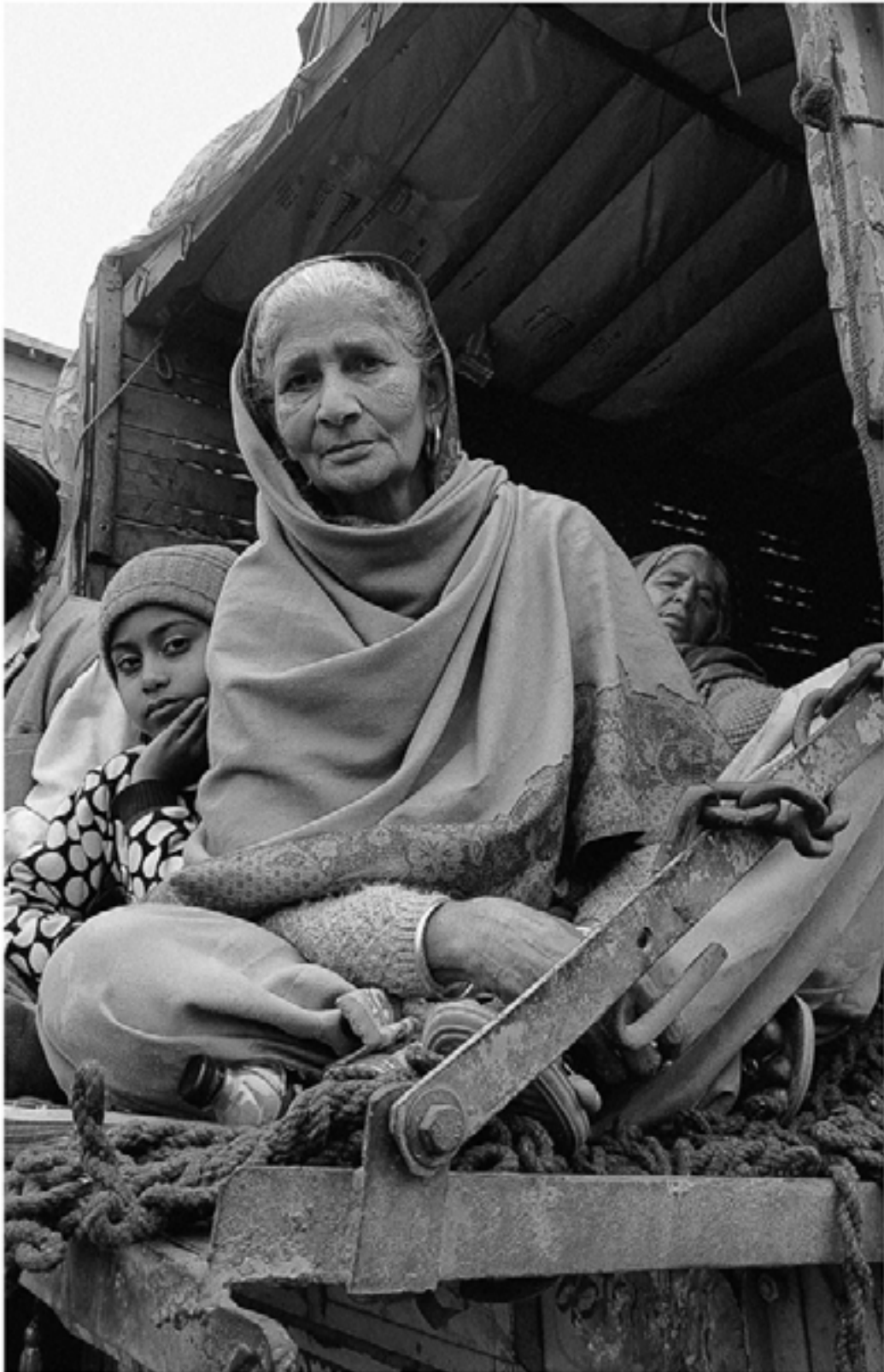
印度的统治阶级没有推动农业现代化，而是进行了公共部门主导的工业化，包括建造巨大的水坝和灌溉工程。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印度工业化受阻于未改革的农业。不断扩张的工业部门需要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工业劳动力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粮食短缺问题因此日益频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减缓了工业化的速度。与此同时，印度的外汇储备几乎耗尽，限制了政府进口粮食的能力。

印度政府在 1956 年请求美国依照《第 480 号公法》向其提供粮食，到 1965 年底，美国已成为印度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在该计划下，印度进口以小麦为主的粮食，并向美国支付印度货币，避免陷入了更严重的外汇危机。美国借《第 480 号公法》向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变政策，尤其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运往印度的粮食质量很差，本是作为家禽饲料的，而非供人食用的。

受 1962 年中印战争和 1965 年印巴战争影响，印度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1965 年的干旱使 1965-1966 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 20%。印度政界人士和外交官便请求美国增加粮食运量，但美国出口的粮食远不及印度所需，目的在于向印度政府施压，以改变两项政策：第一，取消经济发展的进口替代模式，接受外国投资和贸易；第二，削弱与苏联的关系，停止对美国发动越战的批评。1966 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前往华盛顿会晤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她同意了美国

和世界银行的条件，即取消进口限制，取消一系列行业的经营许可，允许美国投资化肥生产，并将印度卢比贬值 57%。结果，印度通货膨胀飙升，经济危机更为深重。印度政府以为美国将向它提供粮食，而世界银行会同意此项货币方案，但两方都没有履行承诺。这对印度政府来说是一种羞辱，变相承认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这场危机中，印度的精英阶层意识到，对于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靠进口养活人民是行不通的。这不仅是主动邀请帝国主义干预印度主权，会让印度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继续受国际市场的供应和价格波动把控，将导致严重的国内危机。这一认识迫使印度政府寻求国内途径，以确保粮食安全，化解危机。



2021年1月7日，一名农民参加了在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举行的货车预备集会。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摆脱危机的两条道路

为化解危机，印度政府有两条路可以走：

第一，土地再分配。印度政府本可以通过土地再分配来实施土地改革，将土地移交给无地农户。土地过度集中早已限制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新的封建关系意味着地主既可以从佃户那里获得高额地租，还可以获得免费劳动力为其私用。地主将租出土地所获得的租金用于放高利贷，而非投资土地和生产技术。租用土地的佃户不会用自己的微薄收入来改善土地，高昂的地租也耗尽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农业投资不足阻碍了农业发展。土地再分配，以及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本可促进社会经济公平和经济增长，生产力进而得意提高，农民消费得以增长，这将促进农村工业化。

第二，绿色革命。20世纪60年代初，农学家诺曼·博劳格开发了矮秆高产小麦，其种植需要化肥和工业规模的灌溉。这种新的农业技术品种比现有本土技术要高产得多。因此，“绿色革命”对于印度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满意的选择，他们认为这样无需进行土地改革便能提高农业生产率。

事实上，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技术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的结合可以创造更高的农业增长率，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收益。但印度政府选择了放弃改革农村土地关系，专注于绿色革命。

1961年，12%的农户占有印度农村六成以上的土地。由于政府的目标是增加农业生产来促进粮食自给自足，服务于工业化，因此不难理解，实施绿色革命技术主要是让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受益，因为改善广大农民生计、实现社会经济公平并非首要考量因素。印度政府设想，随着生产力提高和富农收入增加，这些好处必将逐渐惠及其他农村家庭。

为了帮助农民，政府推动了农学机构建设，与 1929 年成立的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共建了国家农业研究体系，并打造了一个由专业研究机构、农业大学、推广中心、实地研究站组成的大型网络。这些机构为绿色革命技术的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持。新的高产品种需要大量水资源以及农药。正因如此，绿色革命技术只能在具备运河灌溉系统的地区实施，如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西部、印度南部的沿海平原等。而印度七成的农田没有使用绿色革命技术，这些村庄仍在沿用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

为将绿色革命技术扩展到全国其他地区，政府大量投资地面灌溉。1951 年至 1991 年，运河灌溉面积翻了一倍多，从 830 万公顷增加到 1750 万公顷。农民借助银行贷款，通过钻管井和孔井的方式增加灌溉。1961 年至 1991 年，管井灌溉面积从无到有，增加到 1400 万公顷。随着运河灌溉的扩展，即使是小农户和贫农也开始使用高产种子和化肥相结合的绿色革命技术。

主管农业发展的政府机构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无法自行投资提高生产力。灌溉、防洪、土地开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核心领域所需的投资规模是相当大的，超过了个体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只能由国家来完成。此外，农业生产伴随着如洪涝、干旱、冰雹、害虫等多变的自然因素，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这一多变性。市场价格也是多变的特别是小农无法通过谈判降低投入成本，也无法左右产品的市场价格。获得信贷、补贴投入、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维持最终产出的有偿价格体系都需要国家支持。国家通过其制度机制承担了一些风险，使农业发展得以落实。这些制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融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虽然这些制度工具对大农户更有利，但是它们仍然支撑起整个农村经济，甚至为无地农业工人提供了一些救济。在 1991 年印度经济开始走向自由化后，没有一任政府能够完全瓦解这些制度，其韧性可见一斑。莫迪的三部农业法是根除这些制度安排的一次直接尝试。因此，农民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不仅是为了保护这些制度工具，也是为了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

2020 年 12 月 28 日，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一对农民夫妇在自家的货车里度过冬夜。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2020年12月28日，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一对农民夫妇在自家的货车里度过冬夜。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信贷和价格

印度独立后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 1969 年的银行国有化，实行该政策的关键原因在于农业发展急需信贷支持。在国有化之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一直由私人银行和政府控制的印度国家银行 (State Bank of India) 所主导。这些私人银行的办事处都设在城市中心地区，在农村地区没有开展实际业务。银行的董事会成员是实业家，本能地会把钱借给工业部门，而非农业部门。1961 年，印度有七成劳动力就业于农业部门，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但只获得了 2% 的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拒绝相应政府向农民贷款的号召，因为在它们看来，向农村贷款永远无法获得与工商业贷款相同的回报率。由于这些银行未能投资农业部门，国家在 1969 年将 14 家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并将 80% 的银行业务置于公共控制之下。

政府要求新成立的公立银行至少将其 18% 的信用贷款投放到农业。这些公立银行因此开始在农村地区设立分行，主要集中于实施绿色革命技术的地区。

银行国有化后，上百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除农村放债人以外的贷款方式，这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投资。银行拿出工业和贸易信贷的利润以交叉补贴的方式向农业部门发放低息贷款。农民不仅获得了季节性作物贷款，还得到了购买拖拉机和喷雾器等农机设备的长期贷款。虽然地少的农民也能获得信贷，但根据土地规模发放的贷款方式对大农户更有利。政府还出售如种子、化肥等有补贴的农业投入，补贴降低售价的私人化肥制造商。总的来说，银行国有化加速了农业发展。

1960 年，政府开展了最低支持价格 (Minimum Support Price, 以下简称最低价格) 计划；五年后，政府成立了印度食品公司 (Food Corporation of India, 以下简称食品公司)。最低价格和食品公司的宗旨是解决农业部门的一个基本困境：如果食品价格太低，农民会受苦，但如果食品价格过高，工人会遭

殃。每种作物的最低价格均为固定，这样农民获得的作物价格就能覆盖其种植成本，并为农民提供合理的收入。反过来看，食品公司则从受最低价格保障的农民那里采购粮食，并以合理的价格将这些粮食提供给工人。整个机制都由政府补贴，从而平衡了彼此间的相互竞争。政府通过公共分配系统将采购到的粮食出售给工人和农民。多余的粮食则存放在食品公司的仓库，若遭遇连年歉收可作为缓冲，并在市场上用作反周期措施，保护工人阶级免受食品高通胀的影响。

但是，并非所有农民种植的农产品都由食品公司收购。其余的则卖给贸易商，他们相对于个体农民更有优势，因为贸易商能够压低出价，延迟付款，并在秤上动手脚以欺诈农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印度各邦成立了农产品营销委员会（以下简称农销会）来规范购销集市，在集市建立仓储基础设施，对贸易商的行为进行监管。食品公司从农销会所管理的仓储中购买谷物。

然而，由于政策目标的局限性，政府绿色革命和农村信贷政策收效有限。这些新技术的主要受益地区是具备灌溉条件的邦，它们可以获得了更多的农业信贷。通过最低价格所收购的粮食，大部分只来自以下地区：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西部等。尽管最低价格目录仅罗列了 23 种农产品，例如谷物和豆类，但大米和小麦最常被购买。这一决策的不公平性意味着那些在半干旱地区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民无法获得政府的全部支持。农销会的建立也没有摆脱这一不公平性，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北方邦西部这三个地区因此享有了更好的市场基础设施。在旁遮普邦，每 116 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受监管的购销集市，但在安得拉邦，一个购销集市要为 85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村庄提供服务。购销集市的距离对小农和贫农有重大影响，因为更近的集市意味着更低的运输成本。



2020年12月10日，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一名参加早期抗议的农民坐在他的货车上阅读旁遮普邦革命诗人帕什的作品。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阶级的僵化

绿色革命发生不久，印度内政部开始担心加剧的农村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他们所担心的正如内政部长亚什万特劳·查万所说的那样，绿色革命很可能演变成红色革命。查万所在部门 1969 年制作的报告《当前农业紧张局势的原因和性质》（*The Causes and Nature of Current Agrarian Tensions*），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清晰的评估：

首先，绿色革命的新战略很大程度上建构于过时的农业社会结构。所谓的各农业阶级，其利益也并没有在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上达成共识。其次，新技术和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生产，然后才是社会需求，这就造成了不平等、不稳定、动乱因素愈加突出的局面，且局势有可能更为紧张。

正是这种政策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形成了内政部不愿面对的工作，即应对农村的反抗活动。1969 年内政部报告生动地写道，印度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构成”将产生有组织化的农民阶层，并以“爆发冲突告终”。必须通过债务陷阱消弭农民士气，并加强富农阶级对农村的控制以防止冲突的爆发。

更为富裕的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建立的制度机制。该制度系统的建立是为了向拥有更多土地的人提供更多的银行信贷以及在最低价格和化肥补贴政策上的更大优势。由于政府更关心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而非改善印度农村的不平等，因此富农成为了这些政策的最终受益者。

由于富农垄断了政府银行的信贷，小农和贫农不得不继续寻求民间借贷。根据最新的农户状况评估调查，富农八成的贷款来自机构贷款，而贫农只有一半。他们的另一半信贷来源于非机构借贷，如高利贷者，这使贫农陷入债务陷阱。农业工人的情况依旧不乐观，他们 88% 的借贷来自民间。

许多无地农民和贫农为了能够获得土地的使用权，需要成为佃户或是从其他农户、通常是不劳而获的地主那里租赁土地。官方数据低估了印度佃农的规模。调查显示，佃农占耕户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在安得拉邦沿海的一些地区，佃农占到农民的七到八成；在比哈尔邦，26% 的耕种者是佃农。贫农经常通过签订租赁合同，利用家庭劳动力增加土地持有量。

租赁合同大多是非正式的口头协议，因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不劳作的地主想要规避那些由法律赋予佃农的对耕种土地所享有的权利。由于没有所有权，无地农民像贫农一样无法获得制度支持，无论是农作物贷款还是长期贷款。为获取信贷，这些佃农向地主、富农、民间放债人、商人寻求贷款。利率很高，租户因此往往被迫提供例如免费劳动力的非财务回报。当庄稼歉收时，农民会陷入更深的债务陷阱。小佃农和贫农的收入被租金支付大幅削减，如医疗费用、农作物歉收等的任何冲击都会迫使他们接受非正规贷款，进一步加深当地债权人对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在没有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佃农非但不能向最低价格系统出售产品，他们还经常被迫以远低于最低价格的价格水平将庄稼卖给贸易商。

这些问题是在 1991 年印度开始走向自由化之前，即整个信贷和价格体系开始崩坏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自由化与农业危机

1990至1991年，印度政府面临严重的外汇危机。外汇储备跌至12亿美元，仅够支付两周的进口费用。印度政府向伦敦空运了47吨黄金，以担保伦敦银行的4亿美元短期贷款。印度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1991年11月，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很困难，因为世界已经改变。印度也不能幸免。印度无法参照自己来改变世界，但必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生存和繁荣。经济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场道德剧。”

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指，印度仍有其他摆脱危机的选择。但印度政府选择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条件苛刻的贷款。在这些条件下，印度被迫在结构调整方案的框架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得到了大都市和印度资本的热烈支持。这一改革议程意味着政府政策将不再保护印度人民免受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

政府开始解除对银行业的管制，向新的私立银行发放执照，这些私立银行随后与公立银行展开竞争。这对农业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时，自由化支持者鼓吹这样一个缺乏依据的观点：由于农业信贷配额的实施、农业银行利率的上限设定以及农村银行分行网络的建立，银行业遭受了损失。由于很难与新的私立银行竞争，公立银行削减了其农村部门。原本用于农业的信贷流向了包括增长缓慢的金融业在内的其他领域。农业信贷萎缩，农民只得再次投向剥削性的非正规信贷。

1995年1月1日，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进口数量限制放宽。许多还在几英亩土地上耕作的印度农民被迫与跨国农业企业和发达工业国家的农民竞争，这些农民经营着数千英亩土地，还能获得政府的巨额补贴。

政府不仅打开了农产品进口的大门，还通过削减补贴压榨印度农民。化肥价格上涨，导致种植成本增加。私营企业通过标榜作物产量和利润双高的大规模公关活动，诱导农民购买昂贵的种子和杀虫剂，抬高种植成本，产量却不见增加。德干高原半干旱地区的棉花种植就是鲜明的例子。政府虽鼓励农民种植棉

花出口,但对农业综合企业放松管制,导致伪劣种子买卖和杀虫剂滥用,农民遭受虫害造成的连续歉收的影响。多年来国际棉花价格的下跌在该地区引发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农民自杀率也随之攀升。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也急剧萎缩。地面灌溉面积在1991年后不再扩大。由于缺乏修缮和清淤,运河覆盖面积缩减了100万英亩。正因如此,在1993-1994年和2004-2005年期间,农民收入年增长仅为1.96%。

成本的高涨、世界市场的低价、农作物的歉收共同引发了持续性的农业危机。自1991年以来,政府缩减了对消费者的粮食补贴,给数百万印度人的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从1995年到2001年,印度的营养不良人口增加了近2000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3年发布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显示,在当时全世界8.42亿营养不良人口中,占四分之一的2.14亿人生活在印度。在这个十年里,至少有25万农民因负债丧失生存希望,最终自杀。

这样的农业危机并没有殃及全社会,它主要影响小农和贫农。富农往往经营园艺、水产养殖等多种领域,他们能够通过这些重要行业的国际市场来缓冲危机。他们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也有能力在不景气的年份承受亏损。自由化对大农场主并不像对农业社会中的其他成员那样无情。

1991年以后,自由化的危害开始波及田间工人、工厂工人、失业者、贫民窟居民等,骚乱和反抗随之而来。这其中有农民自杀的悲痛;有反对侵占公地的群众抗议,如奥里萨邦发起的反对浦项钢铁公司侵占槟榔园的运动;还有在巴塔帕索尔村针对经济特区土地掠夺的耕地保护运动。印度的每个邦都经历了动荡,群众生活水平恶化,就业前景依旧停滞。为了给工农业资产阶级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跨国公司和印度企业创造价值,人民的生活已经支离破碎。“社会发展”的代价沉重地砸向原住民阿迪瓦西人和受压迫的达利特人,前者的土地是资本剥削的首要物质条件,后者在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下从事田间劳作。但在如今的印度,日常生活的残酷却难以催生政治活动。社会安全缺失、危险的不稳定工作、碎片化的社区、长途迁徙、每日长时间的通勤,都使政治行动的组织困难重重,但也使政治行动的需求更加迫切。



2020年12月31日，在德里和辛古的交界处，妇女们在装饰一种锡克教的结构物。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暂时的缓和

2004年，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赢得了议会选举并组建政府。联合进步联盟在议会中得到了左翼政党的支持，左翼力量主张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议程，要求政府支持农业生产者。这些协定记载于《施政最低纲领》中，该文件概述了联合政府的目标。纲领的六项基本原则之一明确主张政府要“提高农民、农业劳动者、工人的福利和福祉，特别是非正规部门工人，并确保他们的家庭在各个方面未来都有保障。”

农业信贷发放和农村公共投资得到了改善。2005年，政府推出了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即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承诺为所有农业工人提供一份百天的工作，为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并通过水域开发提高易旱区的地下水水位。这些项目推动了农业扩张，尤其促进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农民发展园艺作物和家禽养殖等多样化经营，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全球农产品价格保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8%的年增速，公共和私人投资也在增长，这些也起到了促进作用。2004-2005年和2011-2012年间，农民收入每年增长7.6%，而前几年仅为1.96%。

尽管左翼力量不断施压，联合进步联盟政府还是在许多领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使得印度资产阶级从中受惠，蓬勃发展。这一转变在联合进步联盟不再依赖左翼支持的第二个任期，也就是2009-2014年，表现得尤其明显。在此期间，政府进一步放宽化肥行业，放宽土地租赁，开放农业期货交易，启动了农业市场化改革。换言之，联合进步联盟在其第二个任期就为后来莫迪全面提速新自由主义做了铺垫。

印度的大资本与政治阶层紧密勾结，利用私有化政策攫取盈利可观的公共部门资产等公共资源，通过迁移村庄和森林部落获得大片土地，控制国家的矿产资源，并通过欺诈、拒付等一系列手段来破坏公立银行。包括私有化、贸易自

由化、通货紧缩政策在内的这一过程，就是普拉巴特·帕特奈克所说的“侵占式积累”，即资本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控制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从 2008 年起，工业家穆克什·安巴尼每年都能出现在福布斯亿万富翁榜上。他的净资产在 2008 年就高达 208 亿美元，本人即将成为欧洲和北美以外最富有的人。而当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 2009 年获得连任，将在没有左翼支持的情况下执政时，股市止跌回升，在五天内就将安巴尼的公司市值提高了 1200 万美元。

莫迪病

2011 年，包括穆克什·安巴尼在内的印度大资本家们，参加了一个名为“活力古吉拉特邦”的秘密会议，他们在会上夸捧该邦的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选择性忽视他因在 2002 年实施穆斯林种族灭绝而遭遇的指控，纷纷支持他竞选总理。出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渴求，这些资本家希望依靠莫迪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和“土地改革”，前者的举措包括削减工会等。三年后，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赢下议会选举，莫迪成为印度总理。

莫迪政府一上台就面临棉花等出口作物国际价格暴跌、长达两年的干旱、农业增速放缓等问题。莫迪政府非但没有解决这些危机，反为印度平添三场新的经济灾难：

第一，2016 年的废止通货流通。莫迪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将八成以上的货币退出流通，导致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需求被迫萎缩。当农民发现手中的现金一文不值时，只好将牛奶和蔬菜全部丢弃。

第二，2017 年的商品与服务税。商品与服务税的施行削减了小商贩和零售商本就微薄的利润。农业市场因而受到影响，垄断企业的势力随之扩张，取代了多样化的商贩市场。



2020年12月12日，一名来自哈里亚纳邦的农民在德里和提克里的交界处抗议。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第三, 2020-2021 年的新冠疫情。印度人民党政府未能有效应对疫情的迅速蔓延。2020 年 3 月突如其来的封城迫使数百万外来务工者失去城市的工作, 返回农村和小城镇。当感染率和死亡率上升时, 农产品需求下降。那些缺乏社会保障的农民的处境更加危险。

在新冠疫情危机开始之际, 政府趁机在 2020 年 6 月在议会提出了三项农业法案, 这些法案于 2020 年 9 月未经议会辩论便被通过并写入法律。这三部法案为巨头农业公司进入农业领域大开绿灯。政府声称这些法案能让农民获得最佳市场价格, 事实却是让小农与控制市场信息和享有规模优势的农业企业直接竞争。

这三项农业法案削弱了政府对农业市场本来就有限的监管。此类市场管制自 1991 年以来就一直被抑制, 如今它们将最终走向消亡。

第一: 《农产品贸易和商业 (促销与服务) 法案》。这项法案规定政府管控的购销集市之外的农产品交易将可以享受免税, 这意味着农贩将放弃管制市场而转向自由市场。在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等一些市场受管控的邦内, 该法案已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 《农民 (助农和保护) 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该法允许农业综合企业就具体的作物价格、收购数量和作物种类与农民进行直接谈判。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合同没有任何规定和限制, 口头协议也被视为有效。该法还规定所有与此类合同相关的纠纷将不在民事法庭的受理范围内, 农民将任由企业和官僚摆布。

第三: 《基本商品 (修正) 法案》。通过这项法案, 政府将谷物、豆类、土豆、洋葱等关键作物从基本商品目录中移除。1955 年的《基本商品法》明令禁止了对这类作物的大量囤积和投机买卖。该法旨在防止粮价通货膨胀, 但 2020 年的修正案却允许企业进入谷物交易市场并自由储备农产品, 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投机行为。



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德里GT卡尔纳尔外环路上行进在拖拉机游行队伍中，一位来自旁遮普邦的农民。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农民立马就认识到这三项法案意味着企业巨头将操控农业领域。在印度，农民生产作物的市场收益本就少得可怜：农户种植水稻的收入不及消费者支付价格的一半，种洋葱和土豆只能拿到零售价的 35%。一旦农商企业控制农产品贸易，小农收益势必进一步萎缩。

农民也清楚，只要受管制的购销市场被关停，政府下一步就会减少对谷物的收购份额，甚至可能取消最低价格政策。印度政府已经声明，与其提供化肥补贴，不如向农民发放现金。农民则表示政府发放的现金额很可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最终会被取消。而一旦停发补贴，农民就将面临高额的生产成本，最低价格的取消也意味着农民将孤立无援地面对动荡的农产品市场。

为这三项法案辩护的观点认为，化肥补贴和政府收购基本商品会造成化肥滥用，进而导致土壤退化和地下水资源透支，其中水稻和小麦的种植扩张对环境的影响尤甚。这些说辞难以证明大企业真正关心土壤健康或是用水过度。这些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并非废除已有制度，而是对其进行改良。例如，农民一直以来呼吁政府扩大农作物收购范围，进而提升除水稻和小麦以外作物的产量。该倡议能被落实，政府采购机制便可以向未受绿色革命影响的地区延伸，确保更为均衡的作物收成模式。农业生产投入的优化，需要改进延伸服务，向农民提供技术帮助，而非听从农用化学品公司有关化肥和杀虫剂的建议。加强公共推广服务能够大大减少刺激性农用化学品的使用。

印度农业的问题显然不在于制度支持过度，而是制度执行不充分、不均衡，同时在于这些制度无意解决乡村社会内在的不平等现象。农商企业显然不会开发基础设施，不会改善农业市场，也不会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农民对这些事情心知肚明。

始于 2020 年 10 月的农民抗议活动明确表达了他们对于农业危机、对于三项伤农法律的反应。哪怕是利用宗教挑唆农民，政府的举动也无法破坏农民的团结。新一代的农民懂得抵抗，准备在全印度进行斗争。

任教于旁遮普邦的阿姆利泽纳那克大学的萨尔布乔特·辛格·贝尔教授为此创作了题为《农人颂》的诗作，歌颂了农民的斗争精神：

伐种传家，稼穡不辍
了却我誓言一件
换它良田一片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我的汗水化作泥土香味
我的胸膛撞击风雨激烈
无论隆冬，无论夏夜
无所谓畏惧，无所谓退却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四时回以祝福，权贵奉上残酷
嘲弄灵魂栖居的雕像
恰如那草芥千万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穹庐苍苍，四野芒芒
曾记沃野纵横，麦浪翻香
而今愁怀一念
薄田几片，债台日渐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麦黄覆陇，苗青满目
纵有硕果累累
希望也被市场击溃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死亡降临
帮我解脱束缚

孩子饿了
身体倦了
灵魂累了
梦想像散落的瓦砾
碎了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锱铢尽去，空留身心孑立
我仍要将这饥饿除去
为这贪婪服役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载车麦穗灿如金
熙熙商贾无问津
负债累累，血泪满襟
胸有块垒意难平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我走我的路
但何方是出路？
绞架在升起
农民要革命
锄头镰刀曾经是农具
如今是武器
就这样，我走我的路
直到生命消逝尽了。





2021年1月26日，一辆拖拉机在GT卡尔纳尔绕城公路上冲破路障进入德里，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就此展开。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维卡斯·塔库尔供图。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发轫于人民运动中，为知识分子间的观点交锋搭建平台，
并以倾力于实现人民的愿景为宗旨。

www.thetricontinental.org